

当代德国穆斯林移民

融入方式和状况考察

陈壮鹰 马 绎

摘 要:二战后,经过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德国形成了以日耳曼人为主、多国族裔为辅的移民社会。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信仰中心的穆斯林群体成为其中规模最大的少数族群。虽然德国穆斯林移民在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方面无法与德国本土人匹敌,但得益于德国繁荣的经济状况和积极的融入措施,穆斯林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整体表现相对良好;同时,穆斯林移民对德国的政府机构、政治体制信任度较高。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信仰鸿沟的存在,加之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穆斯林很难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真正认同和接纳,政治参与度不高。而德国在“阿拉伯之春”后接纳的百万穆斯林难民给社会治安和本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令本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融入工作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德国 穆斯林移民 结构性融入 身份认同 政治信任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 (2018) 03-0097-113

自 2015 年 9 月德国打开国门接纳来自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难民以来,超过一百万难民涌入德国,德国迎来战后第四波移民潮,穆斯林移民的数量亦随之激增。虽然德国人早已习惯了与来自土耳其、东南欧等国的穆斯林共处,但近两年频发的难民强奸案、恐怖袭击案等事件,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民间普遍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针对穆斯林的媒体报导或畅销书籍层出不穷,有关德国穆斯林移民的官方报告、学术研究亦汗牛充栋。穆斯林融入问题已被视为德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德国穆斯林移民融入成功与否,社会各界始终莫衷一是——以萨拉辛

为代表的“恐穆派”视穆斯林移民为洪水猛兽,认为其难以融入西方社会,而部分科研机构、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却倾向于认为德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入较为成功。

庞大的人口基数、参差不齐的人口素质和坚定的伊斯兰信仰,使得穆斯林移民的融入问题成为德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德国穆斯林移民的融入状况到底如何?本文拟从德国穆斯林移民群体形成的历史进程入手,结合移民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结构性融入、文化社会融入、政治融入等三个层面考察穆斯林移民的融入状况,探究穆斯林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受教育程度、身份认同、政治参与、政治信任等方面的情况,展现其现实困境并剖析成因。

一、德国穆斯林移民群体概述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政局2016年12月发布的报告《多少穆斯林居住在德国?》显示,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德国有440-470万穆斯林,^①占德国8220万人口的5.4%-5.7%,占1860万具有移民背景人口的23.6%-25.3%。^②其中,230万穆斯林具有土耳其背景,约80万来自中东,50万人来自东南欧,其他主要来源地为南亚、东南亚、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49个国家和地区。^③

德国最早的穆斯林社群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德国最早的清真寺位于柏林的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始建于1925年,至今仍在使用的。^④今天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则源自德国二战后的四次大规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浪潮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本国劳动力短缺,故而西德政府在1955-1968年间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葡萄牙、摩洛哥、突尼斯、前南斯拉夫等国签署引进劳工的协议,其中以从土耳其引进的劳工数量最大;第二次则是客籍劳工家庭团聚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废除原有的轮换劳工制度,为在德工作超过5年的外国劳工签发《延续居住许可证和工作许可证》,大量客籍劳工就此定居下来,并将配偶和子女接到德国团聚;第三次移民浪潮发生在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是战争移民,

^① 该报告特意指出200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的问题。2008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德国境内有380-420万穆斯林,但201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人们将德国人口高估了150万,相应地也多估算了在德外国人的数量。因此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政局认为,2008年公布的德国穆斯林的数据有虚高的成分,与2016年的数据无可比性。

^② Statistisches Bundesamt(Hrsg.):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7, Deutschland und Internationales”, www.destatis.de/jahrbuch, p.41.

^③ Anja Stichs: *Wie viele Muslime leben in Deutschland?*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2016, p.29.

^④ Riem Spielraum: Vom Migranten zum Muslim und wieder zurück- Die Vermengung von Integrations- und Islamthemen in Medien, Politik und Forschung, in: D.Halm, H.Meyer(Hrsg.): *Islam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13, p.169.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苏东地区持续动荡,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大量来自巴尔干、中东、中亚、北非等地区的战争和经济难民涌入欧洲避难,特别是难民政策相对宽松的德国;^①第四次移民潮源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这股政治飓风导致中东地区多国政权更迭,甚至战火连连,造成约450万人流离失所而沦为战争难民,^②申请去欧洲避难的人数陡增。2015年8月至9月之交,默克尔政府放松难民接收限制,慷慨接纳难民,自难民危机爆发至2017年11月底,德国已收到143万份避难申请。^③这四次移民潮的成因、移民规模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为德国社会带来了大量的穆斯林移民。

纵观几次穆斯林移民潮,可以发现,自上世纪60年代的客籍劳工潮以来,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是穆斯林移民德国的主力军,几十年过去后,土耳其移民大多已定居德国多年,规模基本稳定,数据显示,2011-2015年新增的穆斯林移民中仅有3.1%来自土耳其。“阿拉伯之春”后的难民潮为德国带来了近120万穆斯林,进一步改变了在德穆斯林的人口结构——中东穆斯林的大量涌入稀释了土耳其裔穆斯林的比例,土耳其背景的穆斯林由2008年的67.5%降至2015年的50.6%,而来自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则以17.1%的占比成为第二大在德穆斯林群体。德国穆斯林移民群体进一步呈现出多样性和异质性。此外,除来自不同的母国外,德国穆斯林移民分别隶属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别: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德穆斯林的生活》^④称,在德穆斯林中逊尼派占绝大多数(72%),其次较多的是什叶派(14%)和阿勒维派(7%),另有一些小的教派如阿赫迈底亚、苏菲派、伊巴德派以及一些难以区分的小教派。^⑤由此观之,在德穆斯林并非一个单一性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母国,拥有不同的宗教派别背景,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同质化而非同一化的宗教认同结构”。^⑥

^① Peter Doerschler & Pamela Irving Jackson, Do Muslims in Germany Really Fail to Integrate? Muslim Integration and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2, p.504.

^② 汪波,许超:“穆斯林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3期,第61页。

^③ Aktuelle Zahlen zu Asyl(11/2017), www.bamf.de

^④ 该报告呈现的是首个考察全德范围穆斯林生活状况的研究,发布于2009年,该研究对来自49个穆斯林国家的6004名16岁以上移民进行电话访问,整体信息涉及受访者背后的家属总计17000余人。2016年的最新版报告正在陆续发布中。

^⑤ Dr. Habil. Soja Haug & Stephanie Müssig & Dr. Anja Stichs, *Muslim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Nürnberg: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2009, pp.134-135.

^⑥ 刘骞:“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分析和启示”,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5期,第75页。

二、对“融入”概念的界定

在权威杜登德语大词典中,“融入”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从各种事物中)(重新)建立一个整体;第二层意思是,纳入、合并入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去。作为社会学专用概念的“融入”涉及第二层意思,是指将大量的单个个人或群体联结到一个社会文化整体中去的过程,也指融入后的状态。^①

在移民社会学中,社会学家们又进一步对“融入”进行阐释,其中英国社会学家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的划分广受学界认可:他将融入区分为系统融入和社会融入——系统融入指的是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序或冲突的关系,将社会体系的融合视为整体,主要通过市场、组织和媒介等三种机制来实现;而社会融入则涉及单个的行为主体,即行为主体或由行为主体所构成的群体纳入现存社会体系的过程。通常情况下,移民和异族群体的“融入”指的是社会融入。德国社会学家哈尔特穆特·埃瑟(Hartmut Esser)在洛克伍德融入理论的基础上,将社会融入划分为四个维度,即文化适应、确立位置、互动和认同。文化适应是指习得知识、技能和获得人力资本,尤指习得客居国的语言;确立位置指的是在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并获得权利;互动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社会关系(如友谊和婚姻);身份认同指的是行动主体在价值观、公民感和接受度上转向客居国。四个维度间具有因果上的相互关联。“确立位置”以某种程度上的文化适应为前提;只有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后,在客居国社会体系中进行互动和身份确认才成为可能。^②埃瑟教授的融入理论被视为德语国家移民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模式。^③

落实到政治实践中,“融入”这一移民社会学概念被赋予了更加务实的目标和内涵。德国内政部将“融入”描述为“一个以将所有稳定并合法在德国定居的人们纳入德国社会为目标的长期的过程”^④。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公正和内政委员会在200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建立基准化分析体系以衡量欧洲融入政策的成功性》中将“融入”定义为“一个社会将其所有成员整合到积极公民权的新安排中去、以确保多样化社会中的所有成员能长期幸福生活的能力”^⑤。在这一宽泛的

^① DUDEN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acht Bänden*, Band 4, Mannheim, Leipzig, Wien, Zürich: Dudenverlag, 1994, p.1719.

^② Hartmut Esser: *Integration und ethnische Schichtung*. Arbeitspapiere-Mannheimer 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Sozialforschung, Nr.40, 2001, pp.3-17.

^③ Anja Sticks & Stephanie Müssig, *Muslimen in Deutschland und die Rolle der Religion für die Arbeitsmarktintegration*, in D.Halm, H.Meyer(Hrsg.): p.55.

^④ BMI Lexikon Integration, <https://www.bmi.bund.de>

^⑤ Jan Nissen & Thomas Huddleston, *Setting Up a System of Benchmarking to Measure the Success of*

框架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融入”的三种特定形式——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政治融入。^①

尽管社会学界、德国政界和欧洲层面对“融入”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总体来看,这几个层面的融入定义均涉及如下方面:在就业、教育、语言等方面的结构和制度性融入,与客居国主流社会的接触、身份认同等文化社会层面的融入,以及对客居国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政治领域的融入。

三、穆斯林移民的结构性融入

结构性融入涉及劳动力市场、教育水平等领域,是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参数。根据埃瑟的融入理论,移民就业主要属于社会融入中“确立位置”这一范畴——工作岗位为移民带来经济收入和相应的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福利,移民亦有机会借此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即获得相应的社会权利、社会地位,并积累经济和政治资本,因此,“在社会上确立(尽可能中心的)位置是可持续社会融入的关键”,^②也是移民社会参与的核心环节。

在德国,98%的穆斯林生活在前西德各州,其中工业重镇北威州的穆斯林比例高达33.1%,为全德最高,其次是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巴符州、拜恩州和黑森州等。^③总体而言,在德穆斯林的就业状况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穆斯林的就业率明显低于无移民背景的德国居民,且职业地位普遍不高,相应地,平均收入亦偏低。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口失业率明显高于本土居民是移民国家的共性,但由于联邦统计局统计失业人口时不涉及其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很难获知德国穆斯林失业率的精确官方数据,但借助德国经济研究所(柏林)旗下的常设民意调查“社会经济调查”的结果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基督教背景、无宗教信仰受访者的就业率分别高达75%和77%,而穆斯林的平均就业率仅50%(图表1)。^④此外,就业穆斯林还呈现出职位偏低的特征——来自土耳其、东南欧、北非以及中亚/独联体等国家地区穆斯林男性移民中工人的比例要远高于本土男性,工人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取代德国原有的底层民众,成为社会新的底层。^⑤当然,这一现象与德国战后招募低收入、低素质劳动力的劳

Integration Policies in Europa. Brussel: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p.73.

① Peter Doerschler&Pamela Irving Jackson: p.505.

② Hartmut Esser: p.10.

③ Dr. Habil. Soja Haug & Stephanie Müssig & Dr. Anja Stichs: pp.106-108.

④ Holger Schäfer: “Arbeitsmarktintegration von Muslimen: Vermeintlicher Erfolg”, www.iwkoeln.de

⑤ Dr. Habil. Soja Haug & Stephanie Müssig & Dr. Anja Stichs: pp.229-230.

工政策和以客籍劳工及其团聚家属为主体的移民模式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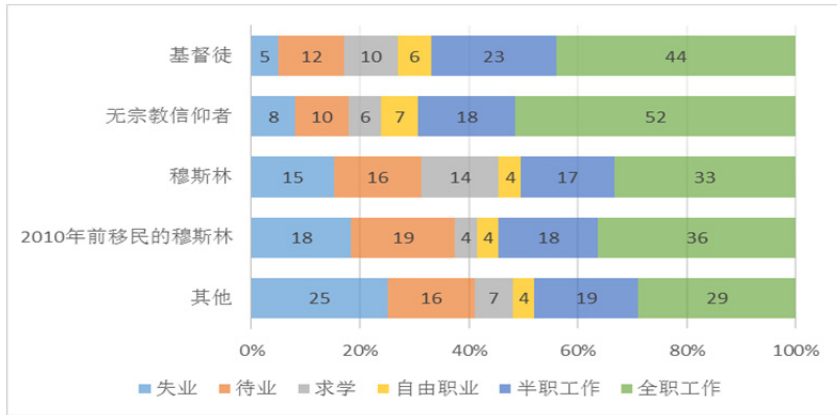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宗教信仰民众的就业状况（针对15-64岁人群；单位：%）

数据来源：德国经济研究所，由作者翻译和绘制

其次，穆斯林移民的就业受到其宗教虔诚度和性别因素的制约。在德国，虔诚穆斯林在就业市场上有一定的短板，一方面，宗教虔诚度高的穆斯林很难找到一份与其资质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成功就业，他们的收入往往远低于并不严格践行宗教要求的穆斯林。^①而在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宗教虔诚度高的穆斯林和虔诚度较低的穆斯林在相同资质下、在相同的职业领域是不分上下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教受到与其他宗教的平等对待，穆斯林在工作中坦诚信仰并践行宗教并不是忌讳。就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女性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男性，这一点在女性穆斯林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穿着罩袍等被视为伊斯兰宗教归属和信仰虔诚的明显标志，且常常被认为是压迫妇女的象征，这使得穆斯林妇女在就业中遭到更多歧视。再者，穆斯林妇女对女性的传统角色分配的认同和服务于家庭的意愿较基督教背景的女性更为强烈，相应地，她们投入职业培训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易遭到劳动力市场的冷遇。

最后，穆斯林的就业情况取决于穆斯林本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有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具体到德国穆斯林移民身上，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则主要归咎于其平均德语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一般而言，穆斯林移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于其他信仰宗教的群体，其中又以土耳其移民的学历水平尤为落后（17%无中学毕业文凭，仅28%有高等教育文凭），伊朗穆斯林则在学历水平上遥遥领先（80%具有相当于文理中学毕业的学历）。即使

^① Anja Sticks & Stephanie Müssig: pp.77-79.

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在学历上明显超越其父辈,且在穆斯林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依然无法改变其整体较高的辍学率和相对较低的文理中学毕业率。另外,移民在母国获得的较高学历在德国通常难以得到认证,也是移民难以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之一。^①

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德国穆斯林在融入劳动力市场方面情况还是相对乐观的: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2017 年 8 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宗教显示器”称,德国穆斯林的就业率比肩全德平均值——60%的穆斯林从事全职工作,21%从事兼职工作,其失业率基本和全德失业率持平,在与其他西欧国家的横向对比中,德国穆斯林的就业率名列前茅,领先于法国(66%)、奥地利(75%)等国。^②虽然这一数据公布后在媒体上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不少媒体批判性地认为这一数据太过乐观,与联邦劳工局和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有一定出入,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德国近年来一降再降的失业率,^③体现了德国劳动力市场优良的接纳能力。此外,穆斯林移民良好的就业状况得益于德国政府对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的利好政策——迅速签发工作许可、当地机构积极介绍工作、开设语言课程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

四、德国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社会融入

在文化社会领域,融入的四大环节中的“互动”和“认同”主要体现为穆斯林群体的身份认同、客居国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和认可等方面。

出于政治正确、甚至是隐忍服从的国民性格等原因,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并不会明确表达歧视穆斯林、反对接纳难民的想法,但民意调查的结果却能暴露德国民众的心声——在德国融合与移民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公布的《融入晴雨表》中,尽管有超过七成无移民背景的德国人赞同在中小学引入伊斯兰教的宗教课程、同意在本人居住的社区兴建外形特征明显的清真寺,但仅有不到一半(46.9%)的本土居民愿意承认伊斯兰已经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④(见图3)。这一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德国人开放包容的人道主义思想、对穆斯林移民享有信仰自由权利

^① Nilden Vardar & Anne Kuhn, “Bildung muslimischer Migranten”, <http://www.deutsche-islam-konferenz.de>

^② Dirk Halm & Martina Sauer, *Muslime in Europa---Integriert aber nicht akzeptiert?*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17, p.30.

^③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2017 德国统计年鉴》显示,德国 16-65 岁年龄段人口在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11.1%、7%、4.6%和 4.1%。参见: Statistisches Bundesamt(Hrsg.), p.361。德国政府称,目前本国失业率处于两德统一后的最低点。

^④ 《融入晴雨表》, <https://www.svr-migration.de/barometer/>

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德国人内心深处对伊斯兰教徒的抵触和文化身份上的不认同。此外,这一调查结果也体现出德国国民和穆斯林移民对穆斯林身份认同上的不对称性。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其的再现与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性。集体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①穆斯林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在种族、血缘、宗教生活等物质因素基础上形成其自我领悟,在一代又一代的漫长移民岁月中,德国主流社会亦为其设计了一套贬抑穆斯林移民的形象话语,本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导致了两者间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在已有近七成穆斯林移民一代和 85%的穆斯林移民二代认为自己已经是德国社会的一份子时,仅不到半数德国国民承认了他们(图2、3)。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我们的认同部分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影响。^②德国主流社会倾向于不承认伊斯兰是德国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穆斯林群体对德国的归属感——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的归属感要明显低于基督教移民第二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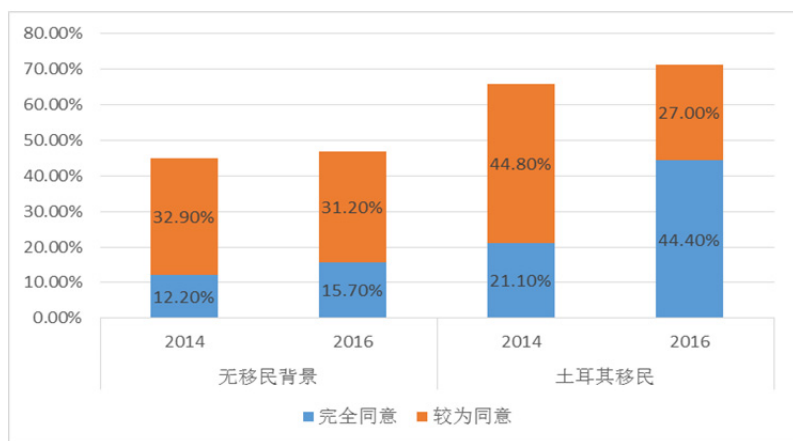


图2 “伊斯兰是德国的一部分”

数据来源:《融入晴雨表2014》、《融入晴雨表2016》,由作者翻译和绘制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7页。

^② 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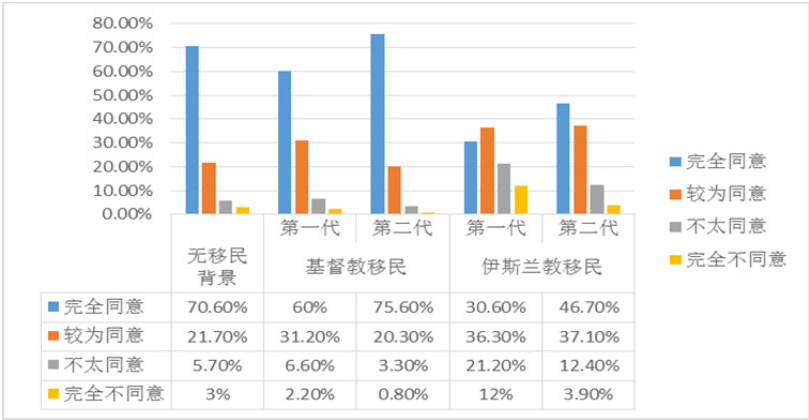


图3 “总体而言，我感到自己属于德国社会”

数据来源：《融入晴雨表 2016》，由作者翻译和绘制

历数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我们会发现，伊斯兰世界本就是与世界基督教相对立的他者，在欧洲主流社会的话语中被描述为邪恶的、野蛮的、乌合的，加之近现代欧洲大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势地位以及流传甚广的文明冲突论，这种话语模式得以强化并流传下来，并在有意识的政治操作下影响主流社会的认知。对伊斯兰世界的蔑视、恐惧和仇恨，演变成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这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差异与不得不面对的共存、融合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穆斯林问题成为德国当代公共话语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之一。

事实上，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的观念，不仅根植于德国部分普通民众的心中，德国政界、传媒界的精英也对此有着隐隐的不确定，并通过媒体传递给大众，甚至有意识地挑起人们的恐惧情绪。前柏林州政府财政委员、联邦银行董事、经济学家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在《德国自取灭亡》一书中表达了对穆斯林移民相当激进的观点：穆斯林移民在劳动力市场融入方面低于平均而在对社会转移的依赖方面高于平均，生育率高但受教育意愿弱，更倾向于形成一个平行社会，另类且具有犯罪性，敌视妇女且易转化为恐怖分子——而面对这一切，伊斯兰研究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均缄默不言。^①该书 2010 年一出版即创下销售记录并引发全国性讨论，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统治阶层火速与萨拉辛的观点划清界限，萨拉辛所属的社民党开除其党籍，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亦从各自的研究

^① Thilo Sarrazin, Will ich den Muezzin hören, dann reise ich ins Morgenland, <https://www.bild.de/politik/2010/neues-buch-deutschland-schafft-sich-ab-13723998.bild.html>; Thilo Sarrazin, Bei keiner anderen Religion ist der Übergang zu Gewalt und Terrorismus so fließend, <https://www.bild.de/politik/2010/spd-politiker-schreibt-in-seinem-neuen-buch-ueber-den-islam-13749562.bild.html>

领域对其带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排外性言论进行抨击,尽管如此,同年九月的多项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对萨拉辛的观点表示赞同。^①2017年初春,精通阿拉伯语的德国电视一台记者康斯坦丁·施莱伯(Constantin Schreiber)撰写的《在伊斯兰内部——德国的清真寺里在祷告些什么》一书亦受到广泛关注。他在走访了德国多座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社团、聆听布道并与其教长交谈后发现,在布道中,信众们被告诫要远离外面有罪的世界、按照伊斯兰的价值观生存,祷告主要强化信众的母国认同,从不宣介德国的正面形象,而教长口中所谓的促进融入不过是融入他们自己的伊斯兰社群。最后他得出结论——清真寺的布道几乎埋葬了德国政府层面为民主、公平和穆斯林融入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而德国政府却将清真寺社团视为非常适合的融入领航员。^②施莱伯的新书主要基于其走访柏林清真寺的所见所闻所感,言辞远没有萨拉辛那么具有轰动性,但其特殊的题材依然触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敏感神经——该书一度位列《明镜周刊》纪实类畅销书榜首位,《时代在线》、《焦点在线》、德国无线电台等主流媒体均对此作了报道并转载了该书的节选,似乎在引导人们关注围绕在清真寺周围的宗教社团对穆斯林融入德国主流社会产生的政治影响。

那么,政客或媒体人的负面言论是否能够代表普通德国百姓的观点呢?基于2010年民调机构埃姆尼德(Emnid)在德国、丹麦、法国、荷兰和葡萄牙所进行的民调,和德国市场研究院对1041名东部德国人和1002名西部德国人的采访所得出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问题。就个体而言,德国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年轻、社会地位较高且经济安全感较高、政治上左倾的人对移民更为友好,更加倾向于赋予伊斯兰宗教团体以平等权力。但总体而言,德国人对穆斯林多持批评态度,仅有34%的西部德国人和26%的东部德国人对穆斯林态度正面,有半数至八成的德国人倾向于将穆斯林与歧视妇女、宗教狂热、滥用暴力、狭隘偏执等形象联系起来。^③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一结果显得颇为消极,但亦有一定原因:

首先,德国民众对穆斯林缺乏接触和了解,易形成偏见。调查显示,在与穆斯林有接触的德国人中,3/4的西部德国人和2/3的东部德国人认为相处舒服,

^① Detlef Pollack: 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des Islam in Deutschland. In: D. Halm, H. Meyer(Hg.): p.89.

^② Marie Wildermann, *Moscheen in der Kritik*. In: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

^③ Detlef Pollack: 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des Islam in Deutschland, p.89.

但问题在于,仅 16%的东部德国人受访者和 40%的西部德国受访者表示与穆斯林有交往,可是联系并不密切。这一比例在丹麦、法国和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均超过 50%,^①因此这些国家的受访者对穆斯林接纳程度比德国人高得多。

其次,穆斯林移民本身的特质也影响了德国人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受德语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穆斯林移民、尤其是以土耳其人为主的第一代移民与德国人之间存在隔阂,其宗教习俗、移民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等又决定了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政治观点等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割礼、清真屠宰、强制婚姻、荣誉谋杀等穆斯林传统习惯更是令德国人侧目。“9·11”事件后,伊斯兰极端分子与西方世界矛盾激化,恐怖袭击在欧洲频发,此前几乎与恐怖袭击绝缘的德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仅 2016 年就先后发生数起带有“伊斯兰国”或萨拉菲极端分子背景的恐怖袭击事件:7 月,一名 17 岁的阿富汗难民在维尔茨堡附近的列车上持斧砍伤 5 名乘客,其中 4 名来自中国香港;仅 6 天后,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安斯巴赫一个音乐节附近自爆,造成 12 人受伤;12 月,一名突尼斯难民枪杀卡车司机后劫车冲入柏林闹市区的圣诞市场,导致 12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虽然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只占穆斯林移民的极少数,但广大的温和穆斯林群体却因此蒙上了一层威胁国家安全的阴霾。

再次,德国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决定了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态度还不够成熟。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德国政界对移民问题始终持回避态度,穆斯林融合问题更是甚少成为公共辩论中的议题。其他西欧国家在这一点上则走在了德国前面,比如实施“多元文化主义、亦即少数民族融入模式”^②的荷兰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便采取了积极的融入措施,保护移民权利;贯彻“共和主义理念下的同化模式”^③的法国则从一开始就赋予移民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的一切公民权。文化环境方面,法国、荷兰等国由于本国的殖民地传统,反而有更加丰富的应对外国移民的经验,主流社会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裔)等穆斯林移民的存在及其文化早已习以为常——与偏好强调本国民族性格、文化特点之特殊性的德国相比,法、荷等国的社会文化更为开放多元,更有利于在本国人和穆斯林移民间破除偏见和

^① Detlef Pollack: *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des Islam in Deutschland*, p.89.

^② 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31 页。

^③ 同上。

壁垒，增强彼此的融合度。

五、德国穆斯林移民的政治融入

移民的政治融入主要体现在移民对客居国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度等方面，指的是移民参与国家政治意志的塑造，并由此进一步承认客居国的民主“游戏规则”，同时培养出移民对政治机构和行为主体的忠诚的过程，属于移民社会融入中的“确立位置”和“身份认同”这两个环节。政治融入被部分学者视为“成功融入过程的终极阶段”。^①

融入是移民自身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移民个体作为融入的主体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运用调控手段对移民主体和移民活动进行有意识、有针对性的干预和调节方面，移民移入的民族国家作为融入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②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德国就生活着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且有日渐庞大之势，但由于客籍劳工模式的临时性特征，短期内并没有出现社会融入困境，德国始终公开否认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90 年代，德国各界关于移民问题的论辩渐起，直至 20 世纪末，面对不可逆转的移民现状以及本国人口的急剧老化，德国人不得不选择正视现实：各党派纷纷承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包括出台新版《公民身份法案》（2000）、颁布德国首部《移民法》（2005）、放松移民入籍归化限制并重新界定和规范了居留权和公民权（2005）、启动国家融入峰会（2006）、制定《国家融入计划》（2007）等。^③其中，针对移民融入的重要主体穆斯林，德国政府也有了实质性的大动作：2006 年，在时任内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的倡议下，内政部和其下属的联邦移民和难民局主导开启了德国伊斯兰联席会议，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 2006-2009、2009-2013、2013-2017 三个阶段。该联席会议是一个与国家融入峰会平行的、德国国家和穆斯林之间的长期协商机制，就伊玛目培训、女性地位、清真屠宰、公立学校开设伊斯兰宗教课程等争议性问题展开对话。德国借此机会认可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犹太族群的平等地位；除了促进穆斯林融入外，德国政府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在日常政治事件的基础上，国家安全政策应在德国穆斯林联席会议的进程中占据部分主导权，并永久地

^① 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第 20 页。

^② 同上，第 20-22 页。

^③ 胡雨：“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及其社会融入”，载《德国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78-79 页。

对融入和宗教等政治领域产生影响”。^①至此，德国穆斯林移民融入问题业已上升到国家任务领域和职能范围的层面。

“移民融入”亦成为新世纪以来每一届德国政府联合执政协议中必定会出现的字眼。2015 年秋爆发的难民危机余震未消，德国政坛愈加呈现出分裂之势。在 2017 年 9 月的德国大选中，两大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遭到选民惩罚，双双收获史上最差战绩。随后由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举行的“牙买加联盟”联合执政预商会晤宣告失败，各党相持不下的难点之一在于难民接纳上限、难民亲属团聚问题。2018 年 2 月，千辛万苦组成的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对移民融入问题给予了更多重视，在由 13 个章节组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单独开辟一章，从规定难民接纳上限、吸纳优质工作移民、成功进行融入和更有效的申请避难手续等四方面，专题阐释了德国新政府在以“要求和促进”为纲领的融入政策框架下调控移民、支持融入的执政构想。^②

德国政客也在各个场合的公开讲话中，向国民表达对穆斯林移民的认同以及政府促进移民融入的态度和决心。如 2010 年 10 月 3 日，时任总统伍尔夫(Christian Wulff)在两德统一庆典上发表了题为《珍惜多样性、促进凝聚力》的讲话，并强调：“我们有着基督教-犹太教的历史，但今天，伊斯兰教也属于德国。……‘我们是一个民族’这句统一的呼唤如今是对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的邀请……”^③默克尔在李克强总理 2017 年 6 月访德时的讲话中指出：“具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的教育机会、在科研领域的参与程度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高。因此我坚信，积极接纳少数族裔、平等对待他们，是阻止极端化的最好的预防政策。”^④

德国莱布尼茨社会学研究所主导的“德国普遍社会学研究”2008 年的一系列涵盖 14 组多变量数据的研究显示，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对德国的民主政体以及对议会、联邦政府、政党、司法、警察等国家机构及其国家所提供的医疗保障、教育等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要高于无移民背景的德国人。^⑤而这一情形并不仅仅

^① Riem Spielhaus: p.178.

^②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StatistischeSeiten/Breg/koalitionsvertrag-inhaltsverzeichnis.html>

^③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Christian-Wulff/Reden/2010/10/20101003_Rede.html

^④
<https://www.bundestkanzlerin.de/Content/DE/Rede/2017/06/2017-06-01-rede-merkel-deutsch-chinesisches-forum.html>

^⑤ Peter Doerschler & Pamela Irving Jackson, pp.503-523.

局限于德国——德国明斯特大学2017年底公布的一项针对欧洲16国居民的研究也呼应了这一点：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相比，欧洲穆斯林对欧盟的评价尤为高，在对欧洲议会的信任度评价中，穆斯林受访者给出了5.2的高分值，明显高于天主教（4.5）、新教（4.7）和犹太教（4.7）的受访者。^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包括德国公民在内的欧洲原住民对既有政治体系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德国穆斯林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在“推拉理论”作用下，穆斯林移民在母国的贫困、战乱、宗教迫害等不利于生存发展的因素形成推力，而德国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形成拉力，促使移民行为的发生。因此，即使穆斯林移民来到德国后不得不经历艰难而漫长的开拓过程，大多数移民的整体生活水准依然得到了显著提升，两相对比之下对客居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医疗条件等产生了好感。

然而，对德国的民主体制和国家机构抱有较大热忱的德国穆斯林，在政治参与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以德国最大的穆斯林群体土耳其裔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德土耳其人就开始有意识地参与政治以达到自身的利益诉求，主要通过加入德国政党、组建市民社会团体和媒体传播等三种方式。^②其中，加入德国政党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参政方式，但德国政党早年只吸纳德国籍的公民，即使后来一些左派政党愿意吸纳非德籍党员，穆斯林党员也只是党内的极少数，分配到联邦和州议会层面，影响力更加有限。在联邦层面，已有多位穆斯林政治家担任要职，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绿党党魁、土耳其裔泽姆·奥茨德米尔（Cem Özdemir）和首位进入内阁的土耳其裔女性、在第三届默克尔内阁中担任移民、难民与融入国务部长的社民党人艾丹·厄策谷兹（Aydan Özoğuz）等，但整体而言，穆斯林从政率低于平均——以2017年9月大选后组成的新国会为例，709名议员中仅有约15名国会议员是穆斯林，^③占议员总数的2.12%，而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则占到德国总人口的5.4-5.7%，几乎所有穆斯林议员均隶属于社民党、绿党、左翼党等偏左的政党，母国多为土耳其和伊朗，其中部分议员在本党或本选区中主要负责与移民、融合事务相关的领域而非在更高的平台上处理更宽泛的

^① Mutjaba Isani & Bernd Schlipphak, In the European we trust: European Muslim attitudes toward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017, Vol.18(4), pp.658-677.

^② 汪波，王佳尼：“德国土耳其穆斯林的政治诉求、参与和影响”，载《宗教和美国社会》2015年第1期，第84-110页。

^③ 该数字由作者根据德国国会官网（<http://www.bundestag.de/>）公布的议员简历统计，由于部分议员没有标明宗教信仰，故作者根据其姓氏、长相、出生地等几个要素进行了筛选后得出以上数字，仅作参考，准确的数字应略高于作者的统计。其中约10位土耳其裔、3-4位伊朗裔、2位非洲裔。

议题。在地方政治层面，有移民背景的议员比例远低于移民背景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在 2011 年发布的有关德国大城市中移民背景市议员的调查报告表明，2001-2011 年间，77 个 10 万以上人口的德国大城市议会中总计有 4670 位议员，其中仅 4% 的议员有移民背景，但这些城市生活着超过 1/4 的移民；在有移民背景的议员中，土耳其裔占比最高（38%）^①，穆斯林群体无法得到充分的代表。当然，穆斯林移民参政情况不佳有着复杂的原因，但这至少折射出德国穆斯林移民尚未在机会均等、一视同仁的框架下进入德国政治领域。

经历了对移民融入事务无所作为的阶段后，德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实行了积极的移民融入政策，建立了与穆斯林社团的长期对话平台，为穆斯林移民的融入创造了更好的框架机制。虽然穆斯林移民的从政比例并不尽如人意，但在政治融入的另一个指标“政治信任度”上得分较高。在民主国家，公民对机构、领导人和政治体制准则的信任，是维持良好治理和民主正当性的必备因素，这种信任一旦遭到腐蚀，则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引发反制度运动甚至动摇民主国家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包括德国的穆斯林群体对政治体制较高的信任度，对于后“9·11”时代深陷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西方社会而言，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结 语

“9·11 事件”以来，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及其融入问题成为公共舆论领域最常见的议题之一。林林总总的观点中，流传较为广泛且颇有群众基础的一个说法是：穆斯林融入西方社会是失败的——该观点秉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基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间存在核心价值差异、两者无法相融的论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而一系列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的恐怖袭击则成为该观点的有力佐证。这一片面论断经过部分媒体的扭曲、极右翼政党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后遭到放大，成为对穆斯林融入现状的刻板印象之一。应当认识到，德国穆斯林只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的总称，他们在教派、母国、移民原因、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将其融入状况笼统地定性为成功或是失败。

事实上，多项官方或基金会发布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均显示，伊斯兰移民的融入并没有普遍认为地那么糟糕。由于德国政府对穆斯林移民融入问题的迟滞处理，很多针对德国穆斯林的统计调查在近几年才启动，数据相对较新，我们很难选取多个时间节点，通过对比指数间的差异来考察德国穆斯林融入状况的进步，但我

^① Karen Schönwälder & Cihan Sinanoglu und Daniel Volkert, *Vielfalt sucht Rat. Ratsmitglied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in deutschen Großstädten*. Berlin: Heinrich-Böll-Stiftung, 2011, pp.40-44.

们依然可以对德国穆斯林移民融入的整体状况进行如下总结:

在德国政府积极的融入政策和德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框架下,德国穆斯林移民在结构性融入方面总体上情况良好,就业率在西欧各国中名列前茅;在文化社会层面,德国穆斯林移民与无移民背景的德国人之间交往较少,彼此间缺乏了解和宽容,暂时没有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绝对接纳和认同;在政治融入层面,穆斯林对德国政治体系的信任度高于无移民背景的德国人,个别穆斯林已走上联邦和各州的政治舞台,但整体而言,德国穆斯林在联邦和地方政治层面代表性低于平均水平,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然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从最早的客籍劳工来到德国并逐渐接家属团聚,到一批批的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引发系列社会问题进而使融入问题成为德国社会的显学,其间才走过三四十年的光阴;而从德国政府正视移民问题、展开政治和公众论辩到颁布国家融入计划、完善融入措施,至今亦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显然,穆斯林移民的融入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文化差异、价值分歧、信仰鸿沟等绝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弥合。面对数百万穆斯林定居德国这一无法逆转的现实和趋势,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伊斯兰宗教机构,无论是德国原住民还是穆斯林移民,都应当顺势而为,为融入做出努力。就德国政府而言,可以考虑借鉴荷兰、瑞典等国多元文化主义融入模式的优势和教训,以及法国强制同化模式的利弊,发挥客籍劳工移民模式下移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结构性融入取得巨大成就的优势,进一步为穆斯林创造各个层面的公平参与的可能,以促进穆斯林移民的融入意愿和德国认同。就普通德国公民和穆斯林移民而言,应当进一步学习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增进彼此的交往,承认并接受德国社会的文化、宗教多样性,化解双方的偏见和敌视情绪,以便双方在德国这一移民社会形成常态互动甚至良性互动。媒体则应当放下偏见和优越感,更加客观地看待穆斯林及其融合问题,促进主流社会和各少数民族群间的跨文化接触和跨宗教互动。移民社会学家、民意调查员的职责则在于,用扎实的数据和系统的认知代替无端的揣测,将民众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最后,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在改变德国穆斯林人口构成结构的同时,也给穆斯林融入问题带来更大的冲击和挑战。此前,德国的穆斯林移民以具有客籍劳工背景的土耳其裔为主,该群体曾参与德国战后的经济建设,受到德国法律的政策认可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德国主流社会对其的尊重和接纳,其后辈亦逐步在德国社会占得一席之地。就文化、价值观而言,来自严格实行政教分离、世俗化程度极高的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与德国人之间的

差异，远没有与来自政教合一且极度保守的中东国家的难民之间的差异来得大。因此，对于接纳了一百多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难民的德国而言，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陈壮鹰，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上海，200083；马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7 年 12 月

（责任编辑：刘玉）

An Analysis of Integration of the German Muslim Immigrants

Chen Zhuangying Ma Yi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four massive waves of immigration have transformed Germany into a multi-ethnic society with its largest population Germans. Among all the minorities, Muslims with Islam religion become the largest group. Owing to the prosperity of German economy and positive integration policies conducted by federal government, though they have no edge over native Germans in terms of gaining higher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lack of education, Muslim immigrants perform rather well in the labor market on the whole. Meanwhile, Muslim immigrants are pretty satisfied with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its management as well as its Democracy. However, it is not quite easy for Muslim immigrants to enter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r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a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can't be ignored. Moreover, the widespread of so-called "Islamophobia" even makes it harder for them to be accepted or recognized. Thus, joint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by all sectors of the German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ctu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Integration issue of millions of refugees from the Middle East, who sought asylum in Germany after "Arab Spring", has posed greater challenges for the German society.

Key Words: Germany; Muslim Immigrants; Structural Integration; Identity; Political Trust